

以姐妹之名：论《她乡》杂糅的共同体迷思

古帆¹

(¹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作为美国女性主义乌托邦文学的代表作，《她乡》在解构女性气质、革除制度化母职等方面的进步意义已经得到诸多关注，但小说中与“母亲”形象如影随形的“姐妹情谊”却鲜被提及。作为母亲之间重要的聚合物，姐妹情谊既是形塑自然母亲与有机共同体的关键，也是配合社会机器对母亲实施控制的同谋。因其诞生于“隔离空间”这一特殊历史背景，姐妹情谊在性别空间政治的影响下将共同体固化为仅依靠母性思维方能运作的孤岛。“姐妹情谊”对母亲特质的解构和塑造与这一乌托邦小说中呈现的共同体问题相辅相成，其游离于共同体与社会之间的复杂性揭开了吉尔曼杂糅的共同体迷思。

关键词：《她乡》；共同体与社会；神话/迷思；姐妹情谊；母亲

“In the Name of Sisterhood”: Approaching the Hybrid Myth of Community in *Herland*

Gu Fan¹

(¹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Abstract: As a masterpiece of American feminist utopian literature, *Herland*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for its progressive significance in deconstructing femininity and dismantling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motherhood, but little has been said about the sisterhood that is associated with and supportive of motherhood. As an important polymer among mothers, sisterhood is both a key to shaping natural motherhood as well as the organic community and an accomplice to the social apparatus exerting control over motherhood. Born in a particular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Separate Sphere” which is exemplified by the politics of gendered space, sisterhood consolidates an isolated country that can only operate through maternal thinking. The role of sisterhood in (de)constructing motherhood works in harmony with the question of community pondered in the novel. Its complex wandering between community and society unravels the hybrid myth of Gilman's community.

Keywords: *Herland*; community and society; myth; sisterhood; motherhood

引言

随着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兴起，沉寂多时的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1860-1935)再度引发广泛关注。和她最为人熟知的作品《黄色墙纸》(*The Yellow Wallpaper*, 1892)一样，其乌托邦小说《她乡》(*Herland*, 1915)作为同时期宣示女性主义观念及诉求的代表作，频频出现于当代美国大学课堂中。小说透过三名男子的视角，讨论“她乡”^①在服饰、劳动、育儿、环境等方面的改革，为构想一种不同于父权秩序主导的现实提供了新的可能。学界多将目光置于吉尔曼如何利用“达尔文主义中有关生物——社会变化的观念来支持其对女性角色及责任的改革以及对女性未来诸多可能性的设想”^①，并对小说中的母职乌托邦做出了详细论述，指出吉尔曼“认同母职的崇高性，同时提出必须改革社会环境，以便解决女性‘做母亲’和‘做人’的传统冲突，让女性充分发挥社会潜能”^②。诸如此类研究要么着重考量吉尔曼对母亲形象的反思与修正，要

么将“她乡”作为一个理想共同体（乌托邦）来探索其优越性。他们聚焦的是共同体作为整体的呈现或共同体中个体的变化。但著名的共同体研究学者南希（Jean-Luc Nancy）恰恰反驳了此举。南希认为，个体仅仅是共同体瓦解之后的残余，其不可再分的原子性决定了单靠个体无法形成一个世界。他指出，“共同体至少是‘个体’的‘微偏’（clinamen）”，即“有[原子之间的]倾斜或倾向”^[3]。“微偏”指向某种将个体聚集起来以构成共同生活形态的隐秘联结，是一种隐于言行背后、游离于个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保障了共同体的运作。尽管南希将这种关系推向了“人之有限性”的极端，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却借助共同体与社会的二分法将南希所谓的“微偏”阐释为一种有机关系。他指出：“共同体是持久的、真实共同生活，社会却只是一种短暂的、表面的共同生活。与此对应，共同体本身应当被理解成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社会则应当被视作一个机械的集合体和人为的制品”^[4]。滕尼斯暗示，共同体中存在某些机械、人为聚合的“社会”背后所不存在之物，这让共同体成为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南希则用“神话”（myth）的概念为这种有机关系做出话语层面的注解。他指出，神话“隶属起源，也来自起源，它能回溯到一个神话的根基，正是经由这种关联，它方通过（某种意识、某民族、某种叙事）得以建立”^[3]。神话是共同体得以运作的本体论基础，因为共同体神话书写了共同体中的独体能够共享的故事，形塑了他们的共同记忆和身份，指射了共同体中的共同观念、信仰或叙事从何而来。滕尼斯与南希对共同体的思考都将重心置于代表“关系”的“微偏”，旨在厘清个体间如何建立关联、建立了怎样的关联、这些关联如何影响共同体等问题。与此同时，南希又提出了“神话即迷思”（myth is a myth）的辩证，强调“神话”无论是作为奠基之物或共同体根基，都“不过是一个虚构物，一种简单的发明”^[3]。南希对神话的解构旨在强调共同体的建构性，神话不是自然生成之物，而是神话讲述者的手笔。换言之，南希一面指出神话对共同体运作的重要性，一面强调神话本身的建构性可能中断共同体的运作，这在挑战滕尼斯的共同体——社会二分法之余，更凸显了共同体表现为共同生活这一形态时内部的复杂性。当滕尼斯将共同体与社会看作人类生活的不同阶段时，南希则通过神话将有机关系及其建构性视为共同体这枚硬币的两面，暗示着共同体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囊括了更为复杂多元的关系。南希与滕尼斯对共同体的关照不仅为探索《她乡》的共同体机制提供了新思路，将代表关系、观念、情感的“微偏”纳入考察范畴，更有助于挖掘这一共同体在天然环境中的有机生成与文化层面的建构性，从而进一步审视吉尔曼共同体构想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论及代表个体之“微偏”的关系，就无法忽视《她乡》中一个与母亲形象如影随形的概念：“姐妹情谊”。这一概念在过往研究中鲜有提及，但却密集参与了对颇富改革力量的母亲身份的形塑。事实上，小说每每提及母亲身份的构成，如母性（maternity）、母爱等要素，都势必提及姐妹情谊。在女性互助、互信、共同生活的表象下，姐妹情谊在小说中具备丰富的内涵。基于亲缘关系自然形成的姐妹情谊是共同体有机关系的内核，与国家人口计划共谋、操控母亲生育本能的姐妹情谊转化为一种规训力量参与共同体的权力话语建构，诞生于特定历史语境、具备孤立主义倾向的姐妹情谊推进了共同体改革也暴露其局限性。姐妹情谊所代表的正是共同体问题中令人兴奋的“微偏”，聚焦其在“她乡”的运作机制，挖掘其多元内涵，方能洞悉《她乡》的共同体问题。本文围绕姐妹情谊如何借助复杂的母亲形象对共同体进行构想与审思这一问题，力图提炼出姐妹情谊对母亲与共同体运作的成全、控制与催化作用，并考察其角色对母亲与共同体的影响。

1. 姐妹情谊的成全：自然母亲与有机共同体

三名男子探访“她乡”的旅程宛若寻访桃花源，他们翻山越岭，经一度春秋，终于到达那个传说中的神秘地带。这出寻访记暗示男子将要记录一场去往新世界的“解域”之旅，他们首先面对的便是母亲形象的转变。如一众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她乡”女性的内外着装都与维多利亚时期困于家庭生活的母亲形象大相径庭。她们个个“短发，脱帽，宽松的衣物泛着光泽；一套轻便结实的装束，束身衣，及膝短裤，打着绑腿”^[5]。她们“矫健、轻盈而敏捷”，有着“渔妇和市场女人的力量，却不似那般粗糙笨重”，具有“大学教授、教师和作家等职业女性的智慧，却不比她们局促紧张”^[5]。这一崭新的母亲形象正是女性摆脱维多利亚时期制度化母职的结果。她们无须再扮演家庭天使，也不必消费特定衣着以塑造取悦男性的女性气质。劳动重塑了她们的身份，赋予她们主奴辩证式的奴隶的自由。着装要义在于顺应女性生理条件，让她们在劳作中保持舒适

健康。当男子控诉她们不自然时,吉尔曼反而以这样的母亲形象颠覆自然的定义。如赫达克所说,自然的母亲形象“加强了母亲身上为‘人’的部分,淡化了社会规定的为‘母’的责任,最大限度地表达了其‘人先于性别’的观念”^[6]。

但吉尔曼的野心显然不止于仅仅将母亲还原为“自然的人”。在康奈尔看来,“吉尔曼的乌托邦愿景源于其对自由主义影响之下的社会状况的不满,^[因为]在她看来,一个社会如若建立在无制约的个人主义之上,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共同体”^[7]。自然母亲所呈现的仅仅是“她乡”最显著的变化,但吉尔曼真正关心的是个体之间、个体与社群之间怎样形成不仅仅依靠个人主义支配的社会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成就真正的共同体。于是在《她乡》中,除却母亲这种个体与“她乡”这一社群,还存在另一链接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群的要素——姐妹情谊。小说开篇即指出,姐妹情谊是“她乡”母亲之间独有的情感结构,因为叙述者范抱怨道:“有母亲的地方就找不到姐妹情——几乎找不到。”^[8]在范的生活环境中,母亲身份与姐妹情谊水火不容,婚姻意味着将别人的姐妹锻造为一个家庭的母亲,从此她需要驯顺、谦卑、勤劳、无私地为家庭服务,告别与姐妹欢聚的少女时光。而在“她乡”,母亲身份却与姐妹情谊桴鼓相应。姐妹情谊绵延于女性的个体经验中,既构成了母亲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以一种民族的、社会的、难以理解的广博的爱将“她乡”的母亲紧密相连。而在三名男子踏足“她乡”即感受到的“和谐共存”的初印象中,姐妹情谊首先代表了一种兼具的亲缘、地缘与精神内核的主体间性,成全了自然母亲与有机共同体枝叶相持的局面。

滕尼斯指出,社会是“机械的”,而共同体却是“有机”的,因为社会中的个体遵从基于利益交换而形成的契约关系,但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体间的关系源于本能、习惯、记忆等,是基于亲缘、地缘、精神的天然聚合物^[4]。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讨论英国旧日乡村境况时更形象地描摹了这种关系。他指出:“在一些地方,有效的共同体(一个地方性的社群)仍然存在;在那里,小贩、佃户、手艺人 and 劳工首先成功地成为了邻居,而社会阶层只是次要的。”^[8]由姐妹情谊凝结而成的“她乡”便是这一有机共同体的写照。“她乡”的建立和发展都得益于“姐妹”这一亲缘关系。这个民族的母亲生育下五个女儿,五个女儿又各生育五个女儿,女儿之间凝结起“神圣的姐妹情”^[5]。她乡的人口由此呈指数增长,成为一个民族,姐妹们聚众而居建立文明。姐妹情谊的本质是爱,是一种“一种难以把握的、广泛的团结;一种民族的、种族的、人类的情感”^[5]。这种爱不仅源自亲情,也涵盖了威廉斯笔下的邻里关系:“这里没有战争。她们没有国王,没有牧师,也没有贵族。她们是姐妹,当她们成长时她们便一起成长——她们不靠竞争而成长,她们在团结的行动中成长起来。”^[5]“姐妹情”超越了社会阶级,遮蔽了社会中成王败寇的竞争,以一种温情脉脉的方式在“她乡”绵延。无论出于亲人间的天然情感,或是朝夕相处的习惯,亦或与日俱增的集体记忆,“她乡”的个体就这样自然而然的聚合起来,比邻而居。

姐妹情谊所代表的有机关系不仅局限于亲人们和谐共存的表象,还具有核心价值,滕尼斯称之为“共同领会”。他将“共同领会”视为“一个共同体特有的意志”,一种“相互一致的、结合到一起的信念”,“一种特殊的社群力”和“一种相同的感受”^[4]。“共同领会”强调通过相互理解、彼此影响而建立情与理的同一性,从而形成不言自明的默契。米勒(J. Hillis Miller)试图以“令人愉悦的主体间性”一词说明共同体中的个体如何形成这种共同领会,他强调共同体中的个体都“共享决定其定位的风俗与信仰”^[9],因此个体身份的形塑完全取决于共同体的意志与文化。在“她乡”中,姐妹是“我们”的代名词,姐妹情谊在“她乡”的运作恰恰展现了共同体对个体身份的形塑:“她们几乎缺乏个人的骄傲,总是口口声声地说‘我们’”;她们不会想要给孩子一个姓氏,因为孩子出生之后并非私人的产品;总而言之,“要让她们变得个人化是非常困难的”^[5]。作为一种“民族的、种族的、人类的情感”,姐妹情谊消解了个体与社群的边界。“她乡”不存在个体与共同体的冲突,姐妹们个个都从集体出发思考问题。正因如此,她们方能互相影响,相互渗透,形成共同领会。她乡最令人不解且最具进步性的集体育儿制度便是共同领会悄然运作的结果。在这里,育儿并非母亲的天职,相反的,这是一种如“牙医”一般专业性强、技术含量高的工作,遵从优胜劣汰的竞争上岗制。男子对这一育儿模式颇为不解,他们认为这种模式强行将母女分离,无法让竞争失败又希望做母亲的女孩得偿所愿。但她乡的女性坚持认为,这并非什么剥夺,她们放心将自己的孩子交由她人照顾,并为“孩子能得到最高级的教育倍感高兴”^[5]。这种在局外人眼中可能引发剧烈争端的行为,在她乡却变得理所当然,因为她们是姐妹,那是她们共同的孩子。

姐妹情谊所蕴含的共同领会促使她们积极将集体规则内化为自身意志。集体规则就是主体间性，个人的主体性也诞生于此。集体育儿制度是姐妹情谊作为共同体精神内核的体现：个体之间天然的情感为形成共同领会奠定了基础，而这种不言自明的默契使得集体育儿制度成为可能，从而将母亲从制度化母职中解放出来。

在“她乡”营造的和谐共存的初印象中，以姐妹情谊为名的聚合物成为了将母亲还原为“自然人”的必要前提和将“她乡”形塑为有机共同体的重要保障。它以其天然的情感属性、根深蒂固的亲缘与地缘关系以及构筑共同领会的精神内核重构了独体与共同体的关系，让二者呈现出水乳交融的相互性，谱写了有机共同体的神话。但随着三名男子对“她乡”观察的进一步深入，象征有机关系的姐妹情谊在参与“她乡”生育规则的运作时被授予了隐晦的权力。受到“为了孩子”的理念影响，姐妹情谊在不知不觉间操控了母亲身份的归属，修改其内涵，赋予有机共同体与“社会”共享的机械性。

2. 姐妹情谊的控制：母性与生育规则的冲突

表面看来，姐妹情谊作为一种有机的社会关系，是母亲回归为自然人的重要保障。但面对母性与生育规则的冲突，姐妹情谊却借母爱之名确立了规约母性的合法地位。母性在“她乡”代表生育的欲望，而生育情况决定了她乡作为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和稳定性。欲望可以自由流动，不受控制，国家的前景却必须遵循既定的发展轨迹，尽量可控。在重新界定母性与母爱的过程中，姐妹情谊从共同体的天然纽带转变为国家生育规则的同谋。

“她乡”公民的核心身份是母亲。她们频频提及母性与母爱是母亲身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母性与母爱的关系却并不明朗。母性被视为母亲身份的核心：“母亲身份，是的，那是母性，去生育孩子。”^[5]生育孩子的欲望和经历被“她乡”的女性奉若珍宝。对她们而言，母性是“极致的喜悦，最高的荣耀，是最亲密、最私人也最珍贵的东西”^[5]。然而，母性所代表的天性只是母爱的一部分，因为对她乡的个体而言，母爱“不是一种野蛮的热情，不仅仅是一种天性，一种私人情感，而是——宗教，它包含了无限的姐妹情谊”^[5]。这一囊括了“母性”与“姐妹情谊”的母爱颠覆了社会生活中私密的母女情，转而被注入了象征宗教的信仰体系。在集体育儿制度中，姐妹情谊暗含的共同领会促成了母职社会化与有机共同体的形成，但涉及国家生育计划时，宗教式的姐妹情谊却迫使母亲做出选择与牺牲。当她乡人口膨胀，急需限时时，一部分妇女需要通过控制母性主动弃绝母亲身份：

生育之前有一段极喜状态——那段日子整个人都极想要个孩子。我们学会了以极谨慎的态度面对那一时期。那些尚未做母亲的年轻女子自愿将这段时期推迟。当心中涌起那种急需孩子的情感，她们便全身心投入到积极的工作中，尤其是投入到最重要的直接照顾孩子的工作中，便可平复那种渴望。^[5]

这番解释本是为了阐明母爱能够跨越私人范畴，找到多样的表达渠道，却揭露了姐妹情谊与母性的对峙局面。考虑到国家的生育大局，获得孩子前夕的极度喜悦（母性）需要被控制，被转移，尤其是转移到照顾孩子的工作中。但如上文所述，母职作为一种专业技术，采用竞争上岗制，因而暂时弃绝母性的母亲若不具备照料孩子的资格，便无法投入照顾孩子的工作，她们的私人情感和欲望都缺乏表达渠道。在这种情况下，同气连枝的母性与姐妹情谊间展开了零和博弈，迫使母亲在两种情感中做出抉择。她们自愿牺牲了私人化的母性经验，将其让渡给代表共同体意志的姐妹情谊。在滕尼斯看来，这种以选择为基础的让渡过程正是抉择意志作用的结果，他称其为思虑。不同于共同体高度同质化的本质意志，思虑为社会实现某些特定目标奠定了基础。思虑的前提是面对“两种本性上敌对的观念”^[4]，它们往往表现为目标达成的喜悦与手段实施过程的痛苦。思虑意味着权衡利弊：“只要意愿着的乐趣显得足够重大，这其中所遭受到的牺牲得到了补偿，那么这样的设定就是有必要的”^[4]。在“她乡”中，国家的生育规则将母性与姐妹情谊转化成两种对抗性特质。姐妹情谊与生育规则合流，共同促成共同体实现控制人口的宏愿，同时又理所当然地对母性实施操控，以爱之名让弃绝母性又无法参与育儿工作的母亲噤声。尽管小说强调，弃绝母性是母亲的自愿行为，但这份自愿背后是为实现人口计划的目标而选择承担剥夺母性之痛的思虑，它不再与有机的共同体意志天然契合，而是权衡利弊的社会行为。由此，姐妹情谊从天然粘合剂转变为规训母性的“社会机器”^②，而滕尼斯用以区别“共同体”的“社会”形态也在姐妹

情谊内涵的转变中与“她乡”这一共同体合二为一。

随着被冠以“母爱”之名的姐妹情谊逐渐实现对母性的合法操控，她乡逐渐陷入了一种滑坡谬误。在一切“为了孩子”这一共同利益的驱使下，母性被完全裹挟到择优保优的意识形态中，母亲身份不取决于主体的选择，转而由集体的评估决定。小说毫不吝啬地歌颂她乡孩童的优越性。她们的孩子聪明、好学、性格温良，连叙述者范也忍不住夸赞道：“将她乡的孩子与我国的普通孩子相比就如同将培育得最好，开得最盛的玫瑰与杂草比较一般”^[5]。孩子的优越性有赖教育，但更无法摆脱基因的决定性作用。优秀的孩子们都有最好的母亲，一旦有女子表现出不好的品质，她们便劝服她放弃母亲身份。“她乡”历史发展六百年来刚出现一例罪犯，她们便立刻剥夺了这个女孩的生育权，旨在“将最低档的人种铲除”^[5]。更为奇幻的是，品德最恶劣的女子碰巧没有生育能力。珀西将此举认定为吉尔曼应对其时移民景观所采取的保守政策，指出优秀是纯种的隐喻，保留纯种的制度映射了同时期美国社会面对经济增长、都市扩张、移民涌入的繁盛景观，担心安格鲁—撒克逊血统将遭到玷污的焦虑^[11]。赛特勒也指出这一复兴叙事“旨在解决秋风未动蝉先觉的现代性衰颓”，因此需要“保障白人女性在文化进化中的核心地位”^[12]。基于此白人至上的优生学劣迹，吉尔曼进一步强调了“母亲”的生育功能对提高民族优越性的积极影响。早在其非小说《他和她的宗教中》（*His Religion and Hers*, 1923）中，吉尔曼便提到母亲对净化种族的积极作用：“种族羸弱了吗？她能让其强壮。种族愚笨了吗？她能让其聪颖。世间多灾难吗？她让其清明。仰仗其母亲身份，她能将所有她希求的品质扩散到整个种族中”^[13]。换言之，母亲的生育功能不再受制于个人欲望，转而成为社会生产力的隐喻。生育宛如机械复制，复制最优秀的品质，复制最高贵的人种。更重要的是，这种复制一边延续了女性之间天然的姐妹情谊，一面巩固了姐妹情谊所支撑的“择优保优”体制。姐妹情谊戴着主体间性的面具，让母亲们铭记她们拥有千千万万的孩子可以去爱，从而忘却自己的生育功能已经被工具化的事实。她们以共同领会做伪装，屏障了母亲作为个体在“择优保优”这种权力话语之下的牺牲。是否生育，是否成为母亲不再，也不可能再是母亲个人选择的结果。在确保人口数量稳定性和儿童优越性的生育计划面前，姐妹情谊彻底辖制了母性的自治权。

在姐妹情谊的包装下，“她乡”悄然完成了制度性话语的替换，从育儿问题中挣脱母职束缚的母亲再度落入了生育规则的钳制。以“姐妹情谊”冠名的有机粘合剂化身为国家生育规则的同谋，循序渐进地对母性实施了彻底操控。随着姐妹情谊显露出其扮演社会机器的角色，“她乡”的共同体图景遭到“社会”的入侵，有机的共同体神话糅合了社会的机械属性。有趣的是，这一兼具共同体与社会属性的姐妹情谊不仅撑持了吉尔曼的乌托邦愿景，还引申出了一种具体的合作生活模式。这种生活能否成为可供借鉴的共同体实践呢？这需要考察姐妹情谊的历史土壤。

3. 姐妹情谊的催化：母性思维与隔离空间的相互借鉴

她乡所呈现的合作生活模式在吉尔曼时代就已经赢得共鸣，不少地区出现了合作生活的共同体实践，赫利孔之家殖民地（*Helicon Home colony*）就是一例^[14]。无论时人或后人，都相信这样的合作生活是打破隔离空间（*Separate Spheres*）的典范。吉尔曼构想“她乡”这一共同体的目的也在于此。姐妹情谊催生出的集体育儿模式与计划生育观念都从一定程度上帮助女性从“隔离空间”所设定的刻板印象中解放出来，鼓励他们成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但诚如《她乡》所呈现的那样，姐妹情谊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利用母性思维激进对抗“隔离空间”的同时，也因其孤立主义倾向画地为牢，将“她乡”打造为只属于母亲的隔离的空间。

吉尔曼个人就是隔离空间的受害者。这种基于性别差异形成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空间政治重挫了已婚女性继续成长的可能性。成婚后的吉尔曼被困于家中，女儿的出生更是斩断了她与外界社会的直接联系，失去自由创作空间的吉尔曼最终精神崩溃。在她的非小说《家庭：运作与影响》（*The Home: Its Works and Influence*, 1903）中，吉尔曼将家庭比作吸血鬼来描摹19世纪已婚妇女的普遍经历：“家庭远没有那么美好，它是那般负累神经，那般麻木心灵。家庭生活意味着照料、劳动和失望，仿佛一个静默不为人知的漩涡，偷偷吸干青春、美貌与热情，吸干男人日复一日的劳动和女人旷日持久的爱。”^[15]吉尔曼认为，隔离空间制度下的家庭模式没有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家庭理应是让人放松、休息的舒适空间，却由于严格的社会分工降格为吞噬生命力的恐怖监狱。唯有破除以性别决定劳动分工的制度，方能想象一种良性的家庭关系，成就健康的

社会。“她乡”便是打破隔离空间的社会实践。姐妹情谊的有机关系与制度属性激励并保障母亲们将原本只能在家庭中施展的才能运用于公众事务，相信如此方能构筑更美好的社会。但“姐妹情谊”并非吉尔曼的想象物，它诞生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并与吉尔曼一直主张打破的历史桎梏——隔离空间——密切相关。

诚如诸多学者指出，在“隔离空间”的历史背景下，女性对其性别空间的感知往往是形成姐妹情谊的前提。罗森伯格通过研究 18 到 19 世纪家庭妇女的日记指出，“隔离空间”这一制度迫使家庭妇女互相分担怀孕、生儿育儿等情感负担，从而加强了女性间生理与心理上的亲近感，因而女性之间的忠诚和姐妹情谊变得格外重要^[16]。科特在其专著《女性的缔结》(The Bonds of Womanhood) 中考察了 19 世纪新英格兰地区的“女性空间行为守则”后指出，当时公共空间没有女性的位置，教堂等公益组织便成为她们与共同体唯一的联结，这些组织为女性建立起“通过女性友谊实现情感表达并获得安全感的范式”^[17]。因此，“隔离空间”制度从某种意义上为姐妹情谊的生成书写了另一类历史。姐妹情谊源自弱者之间私密的联盟，是特定历史时空中独属于妇女的情感经验。吉尔曼个人的经历也是“隔离空间——姐妹情谊”之间逻辑关系的映射。她与许多女伴保持着终身友谊，她们彼此间的支持、鼓励与情感帮助她度过了婚后最难熬的岁月。离异之后，吉尔曼更是积极组建并加入女性俱乐部，还在诸多场合发表演讲强调女性美德的社会功用^[18]。但无论是与女性友人的私密通信，还是她频繁现身的女性俱乐部，都如隔离空间的家庭一般，彻底排除了男性进入的可能。诞生于隔离空间的姐妹情谊一开始就与孤立主义相伴相生，“她乡”也没有逃脱这一前提。这个乌托邦建立的前提是男性灭亡、与世隔绝、女性被迫隔离于孤立的空间。直到故事结尾，深入了解她乡的男性依旧是这里的他者。在他们离开之时，理想国的主人公们也保留了桃花源不足为外人道的立场，因为她们“不愿暴露自己的国家，不愿与外界交流”^[5]。

在“她乡”这个孤立的国家中，姐妹情谊不仅展现出强大的聚合能力，还最大限度促成母亲们发挥其天性中的优势。与社会对女性群体的想象不同，《她乡》所呈现的姐妹景观中没有妒忌与竞争，不存在尔虞我诈，姐妹们团结一致为更高的理想——“美、健康、能力、智识、善”^[5]——而奋斗。这样能量巨大的姐妹情谊本身就是依据母性思维 (maternal thinking) 构筑和平政治的体现。拉迪克 (Sara Ruddick) 将母性思维概括为女性从育儿劳动的实践经验中提炼出的一套“关怀理性”，其所崇尚的克己、抵抗、和解、调停的“非暴力行动主义” (nonviolent activism) 观念彰显了母亲保护世界，维护世界、修复世界的态度，因而有助于构建和平政治^[19]。有趣的是，拉迪克提出“母性思维”这一概念的起点是修正诸如“母亲是局外人或受害者”、“母亲的事务就是照料生命”之类的本质主义假设^[19]。她将“母性思维”视为可通过教育传授的技能，故而男性也可通过学习将“母性思维”应用于生活实践中。但经由姐妹情谊催化而成的和谐社会却假定母性思维是隶属于母亲的本质。在男性尚存时，她乡是充斥着战争、掠夺和压迫的双性世界。而当男性全部在战争中丧生后，女性很快便对“诸神之间的战争和掠夺失去了兴趣”^[5]。仿佛只有将女性的天性用于国家治理之时，国家才能呈现出和平的政治局面。这种隶属于母亲本质的非暴力思想在个体与自然的关系中更为明显：“所有食物都取自种子、蛋及其副产品，皆是自然之母的果实。因为母亲她们方能出生，也依赖母亲她们才能生存——生活对她们而言，就是一场围绕母亲的循环。”^[5]自然之母与人类之母一脉相承，个体与生存环境休戚与共。仿佛只有这样的“母性泛神主义”方能成就平静宁和的生存环境。她乡超乎寻常的洁净有序是女性卓越的家务能力在国家管理中得以施展的结果。而在她乡听不到一丝啼哭，则是因为独属于女性的关怀理性在这里发挥作用。如豪斯曼所说，“吉尔曼并非像大多数批评家所预想的那样讨论性别的建构问题，而仅仅讨论性本身的差异”^[1]。“她乡”修改了拉迪克对于“母性思维”的寄望，在这里“母性思维”不再是性别建构问题中可习得的技能，而是隶属于女性的固有特质。将“母性思维”与女性天性绑定无疑落入了本质论的窠臼，这一令人心驰神往的乌托邦变成了只有母亲可以拥抱的天堂。

隔离空间在促成姐妹联合的同时也为这种联合涂抹上孤立主义色彩。在姐妹情谊的催化下，依据母性思维构筑和平政治的理念与隔离空间的孤立主义倾向相互借鉴，一面将“她乡”建构为“家”的避难所，赋予了女性之国无限的生命力与可能性，同时又以其孤立主义姿态巩固了社会对母亲的想象，将这个女儿国打造为与世隔绝的另一个家。姐妹情谊着力催化的共同体神话被困于孤立主义与本质主义的迷思中，难以为真实生活所效仿。

4. 结语

《她乡》的结尾提供了一个微妙的反讽：尽管小说中刻画的女性形象和国家面貌与当时的社会大相径庭，但小说中女性社群运作的效果却恰如现实世界对女性最初的想象，是一个“平静、和谐的姐妹团”^[6]。这一细节回应了南希“神话即迷思”的观点。纵使“她乡”致力于书写一种有别于当时社会风貌的有机共同体神话，对她乡女性的想象却也嵌套于外界所建构的关于女性性格特质的迷思中。而贯穿于“她乡”共同体建构过程的姐妹情谊也以其混杂有机关系与社会机器的属性、支持母亲又控制母亲的能量、打破隔离又制造孤立的特质将吉尔曼的共同体神话改写为一种杂糅的共同体迷思。在这一过程中，有天然情感与机械规则的调和，平等理想与优生实践的并行，激进政治与保守观念的共存。姐妹情谊作为个体之间的微偏，在构筑共同体的过程中呈现出其聚合的粘性与改革的能量，却也在将共同体神话改写为迷思的过程中展现了这种聚合可能存在的危险及局限。作为一个世纪前的思想实验，这一杂糅的共同体迷思在 20 世纪至今的女性运动中屡屡重现：无论是女性平权运动中对有色人种与工人阶级的歧视，还是倡导身体自主与身份认同的解放过程中因性取向与文化差异带来的内部分歧，或是当今跨国女权强调多样性与多元背景下重构的“独立女性”气质，都呈现出团结与排他，赋权与规训交织的图景。这不仅解释了女性共同体内部固有的矛盾与局限，也反映了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总是需要与既定权力话语斗争的困境。《她乡》杂糅的共同体迷思提醒我们，应当警惕共同体理想背后的规训话语及排他性，呼吁我们以更具批判眼光和更开放的想象推进女性团结解放的事业。

注释

① 小说名《她乡》与小说中构建的国家实体“她乡”(Herland)同名，下文以“她乡”指代小说中描绘的女儿国实体。

② 福柯将机器定义为“一套极度同质化的设备，包括话语、机构、建筑形式、规律性决定、法律、行政手段、科学陈述、哲学、道德和慈善立场”^[10]等。概言之，社会机器旨在通过无处不在的价值和政治机构控制人的思想行动。体制是社会机器的显形表达。

参考文献：

- [1] Hausman, Bernice L. Sex Before Gender: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and the Evolutionary Paradigm of Utopia [J]. *Feminist Studies*, 1998, 24 (3): 488-510.
- [2] 曾桂娥. 乌托邦的女性想像：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小说研究[M].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
- [3] Nancy, Jean-Luc.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M]. Peter Connor, et al., trans & ed. Minneapolis and Oxford: Minnesota UP, 1991.
- [4] 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M]. 张巍卓,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 [5] Gilman, Charlotte, Perkins. *Herland* [M]// Gilman, Charlotte, Perkins. *The Yellow Wall-Paper, Herland, and Selected Writing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9: 1-146.
- [6] Hudak, Jennifer. The ‘Social Inventor’: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and the (Re) Production of Perfection [J]. *Women’s Studies*, 2003, 32: 455-477.
- [7] Connell, Jeanne M. Revisiting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An Examination of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s Utopian Vision [J]. *Peabody Journal of Education*, 1995, 70 (4):19-33.
- [8] Williams, Raymond.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M]. New York: Oxford UP, 1973.
- [9] Miller, J. Hillis. *Communities in Fiction* [M].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5.
- [10] Miller, J. Hillis. *The Conflagration of Communit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 [11] Persey, Thomas. *Utopia & Cosmopolis: Globalization in the Era of American Literary Realism* [M]. Durham & London: Duke UP, 1998.
- [12] Seidler, Dana. Unnatural Selection: Mothers, Eugenic Feminism, and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s Regeneration Narratives [J]. *American Quarterly*, 2003, 55(1):61-88.
- [13] Gilman, Charlotte, Perkins. *His Religion and Hers: A Study of the Faith of Our Fathers and the Work of Our Mothers* [M]. New York and London: Century Co, 1923.

- [14] Kaplan, Lawrence. A Utopia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 The Helicon Home Colony 1906-1907 [J]. American Studies, 1984, 25 (2): 59-73.
- [15] Gilman, Charlotte, Perkins. The Home: Its Work and Influence [M]. New York: McClure, Phillips & Co, 1903.
- [16] Smith-Rosenberg, Carroll. Disorderly Conduct: Visions of Gender in Victorian America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17] Cott, Nancy F. The Bonds of Womanhood: “Woman’ s Sphere” in New England, 1780-1835 [M]. New Haven: Yale UP, 1977
- [18] Hobbs, Amy. “The Women Woke Up” : Women’ s Clubs’ Progressive Rhetoric in Gilman’ s Early Utopian Novels [J]. Critic, 2008, 70(2): 31-45.
- [19] Ruddick, Sara. Maternal Thinking: Toward a Politics of Peace [M]. Boston: Beacon Press, 1989.

(栏目主编：侯本塔 编辑：蒋瑀宸 校对：金宇恒)